

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与宗教复兴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历史系教授)

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已经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了世俗化。在这个世俗化社会之中，伴随着什么样的精神危机？是什么主宰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宗教在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功能和特点？今天我的发言，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属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2003—2006年间花了三年时间，围绕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一主题，其中包括当代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69个样本进行了社会学抽样调查，获得了一批具有相当价值的参考数据。下面我的发言将参考引用部分数据。

一、物欲主义的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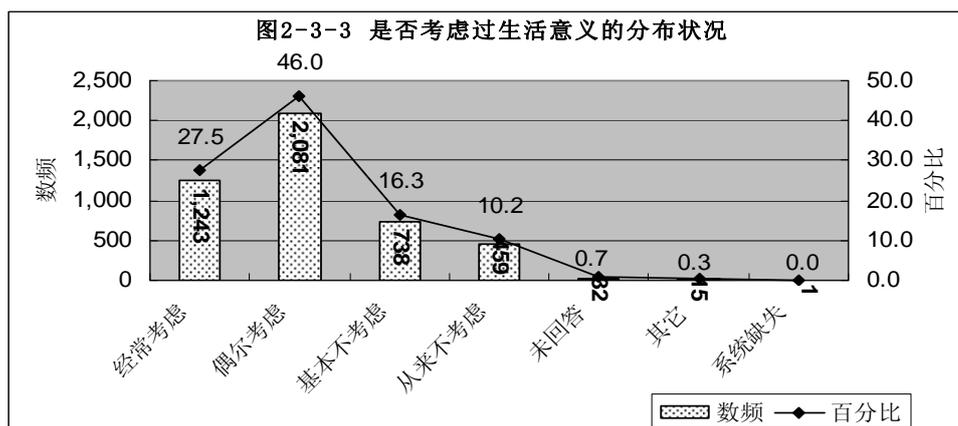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与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儒家文化虽然有以“天”为核心的超越价值，但也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这样，当近代中国开始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儒家思想中的经世精神和功利传统便与国家富强和人的解放的现代化目标结合，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使物欲主义获得了超越层面的合法化基础。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禁欲主义以革命乌托邦的外在形式重新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文革”结束之后，信仰层面的真空使得物欲主义卷土重来，无所阻挡。传统的儒家价值已经十分遥远，毛时代的革命乌托邦被判定为虚妄。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由于宗教性的终极价值之匮乏，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迅速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更加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之后，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性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当代中国是一个欲望无限膨胀的时代，这些欲望基本是物质性的。无限膨胀的物欲维持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并导致了无穷的消费欲望。这些消费欲望并非客观存在，而是通过现代传媒、无所不在的广告被不断地生产、建构和放大。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

获得建制性的合法化身份。由于物欲主义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根据本研究所进行的社会学实证调查，在当代中国人之中，对于生活意义的问题，有27%的人“经常考虑”，而有45.5%“偶尔考虑”，两者相加达到了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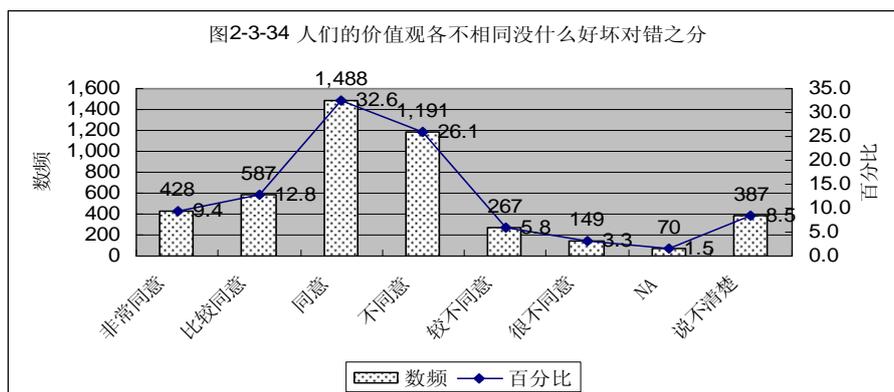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影响很大，但它无法提供给人们以生活的意义，仍然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人继续关心着“生活意义何在”的问题。这就为宗教的复兴提供了心理的空间。

二、核心价值的失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沿海与内地的断裂、物质追求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文化内部的不平衡等等。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高度多元化。但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无所不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社会核心价值的丧失。当社会进入世俗化年代，价值的超越源头失落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认同的危机，社会不再有普遍的价值和伦理标准。即使有道德的话，由于缺乏共同的客观标准，也是相互冲突、内在矛盾。

本研究所的实证调查中，有一个题目，考察受访对象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这一观点：



调查显示：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肯定“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这表明，当价值丧失了客观性源头，而又缺乏公共的讨论来获得共识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和价值实用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在当代中国，价值相对主义背后的道德正当性，是建立在价值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便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理性。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比如，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父母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

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三、世俗化时代的宗教复兴

一方面是物欲主义的价值观无法回应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的失落，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选择时的彷徨，于是当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在社会迅速世俗化的同时，宗教却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虽然中国缺乏欧洲式的一神教传统，但中国却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传统，这就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佛教，还有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它们形成了当代中国五大制度性宗教。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大量的民间信仰，比如祖宗崇拜、民间神灵信仰等等，而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有各种原始宗教。

根据本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的抽象调查，发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在年龄为 16 周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口中，信仰宗教的人数为 31.4%：

表 2-3-1 中国人宗教信仰情况统计概要

	Cases					
	Valid		Missing		Total	
	N	Percent	N	Percent	N	Percent
宗教信仰(a)	1,435	31.4%	3,134	68.6%	4,569	100.0%

如果按照中国现有的人口比例来推算，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 3 亿以上。而在这之前，中国官方对宗教人数的估计，只是在 1 亿左右。抽样调查的另一个数据，也间接证实了这一变化。有 34.3% 的受访者承认：他们“认识人生道理的途径”，来自于宗教，这与 31.4% 的信教者人数相当吻合。

从抽样调查中还可以发现，如今中国的信教者逐步趋于年轻化。从年龄与宗教信仰的交互分析中可以看出，16—39 岁的信众共 889 人，占全部信教人数 1435 人的 62%，而 55 岁以上的只有 137 人，占总数的 9.6%。

那么，当前中国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又是如何呢？

宗教信仰的频次分布

宗教信仰类型	N	Percent	Percent of cases
基督教	274	12.0%	19.1%
佛教	756	33.1%	52.7%
伊斯兰教	223	9.8%	15.5%
道教	147	6.4%	10.2%

天主教	139	6.1%	9.7%
民间俗神	263	11.5%	18.3%
祖先保佑	345	15.1%	24.0%
其它宗教	137	6.0%	9.5%
Total	2284	100.0%	159.2%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 1435 人有宗教信仰的抽样人数中，选择宗教类型的次数是 2284，这表明许多中国人信仰的不止一个宗教。在五大制度性宗教中，信仰佛教的最多，占全部信教人数的 33.1%；其次是基督教，占 12.0%，第三是伊斯兰教，占 9.8%，第四是道教，占 6.4%，最后是天主教，占 6.1%。而祖先保佑和民间神灵崇拜这两个中国传统的非制度性宗教，分别占全部信教人数的 15.1%和 11.5%。

假如我们仅仅考虑制度化宗教的情况，将其中选择信仰民间俗神与信祖先保佑的比例（占全部信众数的 26%强）剔除，那么中国信制度化宗教的人占了信教者总数的 67.4%，大约接近 16 岁以上人口的 24%，在 2 亿 2000 万左右。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发展得最快的是基督教，在进入本世纪后其发展速度仍然不减，很快从不足 1000 万迅速达到 1600 万，这是教会宣布的数字，而实际上它的数量更多。据本课题组的调查，在样本中选择信仰宗教的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有 12%，依此推算，中国的基督徒当有 4000 万人以上。远高于中国教会自己宣布的 1600 万。

本研究所的抽样也对信教的动机进行了调查：

表 2-3-2 有宗教信仰的原因的频次分布

		回答人数		回答人数
		频次	百分比	百分比
有宗教信仰的原因	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	614	24.1%	45.1%
	精神充实、心境安宁	517	20.3%	38.0%
	保佑顺利	411	16.1%	30.2%
	家人影响	406	15.9%	29.8%
	消除灾祸	205	8.0%	15.1%
	宗教文化感人	125	4.9%	9.2%
	没原因，感兴趣	125	4.9%	9.2%
	治病	113	4.4%	8.3%
	其它	36	1.4%	2.6%
合计		2,552	100.0%	187.5%

有 24.1%的信教者选择的是“宗教告知做人道理，与人为善”，20.3%信教者选择的是“精神充实，心境安宁”，而认为“宗教文化感人”的占 4.9%。这表明，有将近一半的信教者在

自己的宗教动机中，有着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功利目的的动机，比如为了“消除灾祸”是 8.0%、“保佑顺利”是 16.1%，“为了治病”是 4.4%，合计有 28.5%。也有着相当的比例。

总而言之，本研究所关于宗教的实证抽样调查，印证了国内外研究界的一个共同看法：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宗教复兴。为什么当代中国一方面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全面世俗化，另一方面会出现强劲的宗教复兴？这里面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有所松动，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其二，当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社会瓦解之后，中国社会愈来愈趋向个人化，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缺乏基本的情感、文化和信仰的联系纽带，于是宗教在日益个人化的社会中扮演了重建共同体的角色。其三，市场经济的社会打破了人们过去确定的生活和未来，激烈的竞争机制使得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产生心理的恐惧，于是祈求各种神灵庇护自己的人生。最后，社会核心价值的失落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反弹，人们重新渴望获得价值和行动的确定性，而宗教的超越世界所提供的终极价值，给予人们以一种明确的人生意义和伦理准则。

虽然宗教复兴继续在深入，然而这一复兴却带有深刻的中国色彩，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与宗教复兴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三种平行化的趋势：人文经典的热潮、宗教信仰的多神化和实用化、民族主义对外来宗教的抗拒。

中国虽然面临着严重的核心价值失落，但大部分中国人对此的解决方式不是宗教的，而是人文的。这与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有关。虽然古代中国有佛教和道教，但这些制度性的宗教并非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来源；具有人文取向的世俗化儒家，在历史上一直是拥有社会核心价值的伦理中心。以人文代宗教，这一中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在当今中国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在宗教复兴的同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也同时在复兴，大众媒体之中，中国古代的人文经典如《论语》、《庄子》持久不衰的热潮和流行，比较起宗教而言，人文经典在社会公众中影响更大，更具有文化的正当性。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人文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鸿沟，一个基督徒往往可能是儒家经典的热爱者。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宗教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神论的传统，神圣与世俗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既是包容的，又是现实的。对一些信教者而言，他有可能同时选择多种互不相同的宗教，比如，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就有相当程度的交叉。而根据本研究所的实证调查，当代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也同时选择了祖宗崇拜和民间神灵的信仰，而非欧洲式的一神论。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非常现实和实用。他们所敬畏的，是一个非常广大、含混、包容性极强的神灵世界。人与神的关系，对中国人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关系，不如说是一个“神人互惠”的关系。神圣在世俗之中，信仰以保佑为基础，成为不少中国信教者的基本逻辑。

比较起本土宗教而言，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还会受到民族主义的制约。从中国近代的历史来看，外来的传教运动曾多次与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大众发生冲突，而国家也总是对外来宗教有所限制。基督教虽然在当代中国发展迅速，其宗教和文化影响日益巨大，但在许多知识精英看来，虽然基督教文化很有魅力，但西方的上帝最终还是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秩

序。而在少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那里，更是将基督教视作外来的文化侵略。外来宗教如何本土化，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本土信仰，从历史上看，决定了外来宗教最终能否扎根中国。佛教本来也是来自印度的外来宗教，但经过几代的发展最终与中国的道教精儒家精神内在融合，发展出中国本土的佛教“禅宗”，遂成为中国自己的宗教，至今牢牢雄居中国社会第一大宗教位置，信众占信教者总数的三份之一。那么，从欧洲传来的基督教是否能够复制佛教的成功？在我看来，是否能够尽快地实现基督教的本土化和人文化，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